

乡村生态的文化理想写意

——“边地”与“商州”的诗意书写与现实写意

朱凌*

目 录

- 引语
1. 想象的审美之源——楚地“秦音”的文化熏染
 - 1) 想象农民的精神地理
 - 2) 地理基因的坚定执守
 - 3) 自然和谐的乡村生态的诗意礼赞
 2. 诗意乡土的建构与现代话语植入
 - 1) 诗意乡土氛围营造
 - 2) 现代话语的植入
 - 3) 寻梦“商州”与乡土“梦碎”
 3. 文化身份的选择与文化审美的执守
 - 1) “乡下人”的审美视角
 - 2) 自在和谐审美精神
- 结语

引 语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贾平凹与沈从文的创作有很多相似性，比如创作心理、审美追求、价值取向、生命意识，以及作品中流露出的浓厚的乡土气息。这些在前人的研究中都有所涉及。这篇文章尽量避免在前人已经广泛“耕作”的领域以及问题上做重复劳动或无效劳动，力图开掘还没有充分关注到的问题。本文试图在“乡村生态”呈现的多元形态的为着眼点，充分挖掘两者笔下的

* 中国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乡村生态”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中承载的巨大的精神能量以及现代化的推动力。比如，他们的作品同样发散着对美好乡村生态的咏唱和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拒绝；他们的文字中饱蕴着歌唱的激情，抒写着乡土的神奇与优美的地域风致，弘扬原始而充满活力的生命形态使人们健康、纯净的道德净化力量；同时，作为游走于城市边缘的“乡下人”，他们本能的对都市文明产生抗拒。不同的是，沈从文采用的是回归原生态的乡土来对抗都市的腐朽、冷漠和罪恶；而贾平凹则尝试游离于时代主流话语之外，试图摆脱意识形态对其文字的掌控力，从而构建心目中的“神圣之土”。实际上，出现于世纪转折与交替的“边地世界”和“商州大地”，同样地处偏远，封闭落后。在历史转折的时代动荡中，如一片扁舟飘摇于乱世。湘西的乡村生态世界时间上已经在混乱的战局中崩析瓦解，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生命常态已然被巨大的外部力量摧毁；商州也在“城市兴起，交通发达，工业跃进，市面繁华，旅游一日兴似一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愈加“显得古老，落后，撵不上时代的步伐”。在沈从文与贾平凹的乡村生态世界中看不到硝烟和败落，那是用美丽的文字过滤了的文化湘西和商州世界。可以说，诗意化的乡村叙事理想超越了现实的残酷，以人性和自然的淳朴和谐之美编织着诗意天空中一道美丽的彩虹，这便是沈从文与贾平凹共同的美学追求。同时，沈从文与贾平凹对湘西、商州乡村无分派别的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精神，也是任何一个优秀作家都应该具生态世界充满着偏爱与眷恋，此中倾注了其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现代化思考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反思。他们扮演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审美理想的继承者以及面向文化未来的开拓者角色，同时又坚决地抵制现代都市文明的弊病给纯美的乡土造成的污染和侵袭。他们在以诗意的审美精神书写“精神之土”的同时，又固守着现实乡村世界的传统文化的道德秩序。“这正是时无分古今，地无分中外，信仰有的良知与责任。”¹⁾

1) 李星，《贾平凹的文学贡献和意义》，《西安晚报》，西安报业传媒集团，2008年11月24日，第15版。

1. 想象的审美之源——楚地、秦音的文化熏染

沈从文在《申辰闲话》中表明他要为“湘西”写出“故乡的民族性与风俗及特殊组织”。事实上，沈从文作品中最具魅力的是关于“湘西”的书写，比如《边城》、《龙珠》、《萧萧》、《三三》、《湘西》、《湘西散记》都是对湘西乡土世界的绝色写照。贾平凹对他的故乡——三秦大地的追忆和迷恋不亚于沈从文，“慰藉这个灵魂安宁的，在其漫长的二十年里是门前那重重叠叠的山石和山石上圆圆的明月，这是我那时读得有滋味的两本书，好多人情世态的妙事都是从那儿获得的。山石和明月一直影响我的生活，在我舞文弄墨、挤在文学这个小道上，它又在左右我的创作。”²⁾“我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³⁾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满蕴着对乡土的深厚感情，《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小月前本》、《天狗》、《商州》、《浮躁》等都流淌着对故乡的深情，其中的乡村情感、风俗景致，都跃动着商州大地独特的情致。

1) 想象农民的精神地理

沈从文和他的文学活动必然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我们的研究应该围绕几个核心问题展开：以广阔的历史视野审视我们民族的文学在历史上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这种存在的一切内因和外因是什么；他对于这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心理产生过什么影响；依照其内部矛盾诸方面运动，又会将民族的文学与文化心理引向什么方向……无可置疑，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与作家及其书写的地域性密切相关。沈从文的湘西的生态世界在文化上完整地保存了楚风遗韵。楚地文化是聚集了苗、土家等民族文化的精髓的崇信人、

2) 贾平凹，《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钟山》，《钟山》杂志社，1983年第5期，第43页。

3) 贾平凹，《溪流》选自《贾平凹小说新作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1页。

神、鬼共生的神巫文化。“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巫者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⁴⁾这种独有的楚地文化结构了沈从文特有的飘逸、瑰丽的神秘而又浪漫的韵味，这便是沈从文精神地理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湘西世界独有的地域历史所构成的生态文化使沈从文作为一个文学家的精神心理结构有一种特有的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湘西地域独具的自然地理特征，在沈从文童年的生活和心灵体验中获得的一种醇厚的“美”。审美历史地理的湘西少数民族历史、审美文化地理的楚巫文化与审美自然地理的湘西大自然，三者共同构成了沈从文想象湘西、想象湘西农民的精神地理。美国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先生认为：“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边疆根子是紧紧靠拢艺术的源泉，而这种艺术又是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的。”⁵⁾沈从文在小说《凤子》中描述了湘西的一隅上，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的苗族城镇。在这里“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的向深四十庄里走去，园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⁶⁾显然，此处的农民过着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一种符合大自然和谐秩序的自然人性生活。沈从文以他者的视角关注这片湘西世界的自然生态。从作品中我们看到苗族农民较完整地保存了乡村生态原始的风俗人情，生命中蕴藏着尚武的勇敢、爱的激情和对大地神灵的忠诚信仰。这种源于大地的武勇、激情与信仰曾是中华民族先民们所拥有的品格。后来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文化专制力量的加强，中原大地上的农民个性和灵气渐渐被束缚、压抑，勇敢坚强的民族血性被所谓的“文化”阉割掉，中国农民患上了奴性、精神麻木、愚昧的精神疾病。面对乡土中国被侵蚀的扭曲的人性及其生活方式，沈从文以重建文明、重建社会的勇气，在湘西这片具有原始气息的大地上，通过对极具个性的

4)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联合编辑出版，1984年版，第330—331页。

5)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25页。

6)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联合编辑出版，1984年版，第330页。

湘西苗族农民的描写，找到了其所具有的原始生命强力。湘西世界的农民的生命形态是独特的，他们视独立自由为生命、以感情契合为爱情婚姻唯一准则，这无疑与20世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视野下的病态、奴性、麻木的当下中国农民生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为乡土中国农民的“人的现代化”提供了可参照、乃至是转化的文化体系。湘西农民孔武有力的性格特质，也为祛除国民奴性、塑造中国农民自由思想提供了一种原生于中国的改造路径。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跨越的不只是几千里的地理距离，它同时跨越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⁷⁾

2) 地理基因的坚定执守

沈从文的故乡——湘西凤凰古为蛮荒之地，先秦时代是以楚文化为中心，后融合中原汉族文化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浪漫情绪与宗教情绪混而为一”，“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缚不可分”。——《湘西·凤凰》楚地的历史文化积淀渗入沈从文的文字中，影响着他的创作风格与性格人生。他所推崇的和谐自然的生命方式和生存态度，所颂扬的轻利重美的原人精神以及悲天悯人的道义担当，都与两千年的楚文化的敏感热忱、忧国好美的浪漫气息息息相通。沈从文一直认为自己的创作是“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水云》）“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⁸⁾贾平凹的故乡——商州与湘西一样，有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底蕴。商州是秦汉文化的发源地，战国时期，这里是秦楚必争之地，商鞅变法后，秦国国力大增，破楚掠地，商鞅作为功臣受到封赏，故此地名为商州。商州

7) 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第3期，第3页。

8) 《水云》，收录《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287-288页。

之地被群山环绕，南北相交，四面合围，气象灵秀却不及江汉潇洒，厚朴却不如中原大地通达。于是，商州尽染了古朴粗犷的地理基因，成就了秦汉文化的气质，又兼有柔媚清丽的楚文化的影响。多元文化的混生是秦地商州人性格中包含丰富的包容性，儒家文化文化的影响也使人们有重义轻财的高尚品质。商州地处偏僻，现代文明冲击的趋势虽然锐利，而此处却比古都西安这样的文化中心变化缓慢得多，商州人也因此保有更多淳朴善良的品行。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的经济体制的变革强劲的涤荡着古朴的乡村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新与旧的观念在这里被整合与转化，文学在这样的语境下更易生成新的表达方式。贾平凹以其赤子情怀，深入地回想和思索，最终书写着故乡土地上的山川景物，自然风情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审美情绪。偏僻闭塞的边地山村，成就了沈从文和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湘西”之于沈从文，“商州”之于贾平凹奏响了楚韵秦音遗世之风的同时也蕴含了作家的文化理想，成为乡村想象的一种新的指称和描述。

3) 自然和谐的乡村生态的诗意礼赞

自现代乡土文学诞生伊始，地方色彩和乡俗风情是乡土文学最重要的基因条件。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兰在其理论著作《破碎的偶像》中强调了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的、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了。”⁹⁾正如湘西世界中明净秀丽而又不失厚重的风物景致千姿百态，如诗如画。可以见到翠竹环抱、茂密葱郁的山林，清澈见底、鱼虾嬉游的深潭，欢唱婉转的画眉、活泼漫步的水鸟，风格迥异、风情无限的吊脚楼以及俊俏挺拔、岩石黛黑的高

9) 赫姆林·加兰，《破碎的的偶像》，选自《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瑞等著，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4页。

山。在这里，河水透明宁静，远山积翠堆茵、如梦如幻，悬崖险峻鬼魅、夹江矗立，傍山造屋，临水建房，重重叠叠，古朴别致；村寨屋宇隐没于丛林翠竹间，各具特色，兼具南国的清秀明丽与北国的质朴厚重。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大地也拥有朴拙雄浑深邃的诗意之美。小说中乡村大都是蛮荒野地，有参天古木，野兽出没其间；有神秘莫测的山村屯落、古塔古溪和茂林修竹；还有条条交错的山间小径，零乱中又显规整；整齐的屋舍溪水绕旁，炊烟袅袅，粮草严实，农具摆放整齐，如入“桃源之境”；河水曲折淋漓，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山泉叮咚作响，冬暖夏凉，取而不竭。商州之地呈现着天然的地域色调，形神兼备，美丽诱人。

沈从文一生以卷帙浩繁的各色文体来构筑他的“希腊小庙”。这样自然和谐的乡村生态礼赞在中国当代文坛中得以赓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粗犷狂放不羁的贾平凹的商州大地。研究者认为，“贾平凹籍属陕西商洛，其文字意境却较之同代的‘湘军’中不少作者更近沈从文，或许可以作为文学创作中代际承传的一段佳话”。¹⁰⁾王德威也认为，“1982年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以散文随笔形式记载故乡风物，不啻是沈《湘行散记》、《湘西》之类作品的当代回声”。¹¹⁾贾平凹与沈从文一样是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商州大地”的文学建构同样以建立在地域因作家的文字而传扬的基础上。沈从文与湘西、贾平凹与商州，人与其生长的地域已经密不可分，正如福克纳被称为“乡下人”，而福克纳总与被称为“福克纳的神话王国”的约克纳帕塌法县一起出现一样。这样，沈从文、贾平凹以及他们生活成长的家乡三者之间的被联接起来，由此产生了可比性论述。这种传承、契合意指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家在乡土的建构上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色和跨地域的一致性。

10) 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11)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8页。

2. 诗意乡土的建构与现代话语植入

1) 诗意乡土氛围营造

“边城世界”犹如梦中的诗意幻境。而诗情画意的构造实际上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一种主观赋予，也许乡村世界的别样风情的呈现是对“另一世界”的读者阅读期待的满足，而观照视角的刻意经营，很自然造成了对乡村生态真实面貌某种程度的遮蔽。对这样的“遮蔽”，研究者也发出过这样的质疑之音。“从读者的阅读心理角度看，倘若我们暂时撇开搜奇猎异的心态、越过作者有意设定的抒情视角，尝试着从作品中乡村主人公的视野来看待那里的风俗与人事，那么，这些奇风异俗与人情习惯对那些在底层社会挣扎着的人们究竟又意味着什么？仅仅只是一派‘不知不识’的天真浪漫，或是一系列诗意盎然的野性爱情传奇吗？”¹²⁾在乡村社会的道德秩序和价值观上，半个世纪以来的乡村社会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理据：“与早期的社会学紧密联络，一种看法认为传统的农民社会是一种合作性的组织，其核心是社区的共同道德价值和制度(Scott 1976)。与这一看法相反，另一派学者主张，农民社会表现出对个人利益极度的关切，因而，农民并非十分注重社区共同的道德价值和制度，而是相当关心个人的得失，对利益问题有理性的判断(Pokin 1979)。”¹³⁾《边城》是围绕三个乡村小儿女的青涩爱情建构起纯美和谐自然的乡村生态故事框架。翠翠和大佬、傩送之间建立在纯美的乡土道德伦理之上的淳朴的原始之力的爱与现代文明语境下温婉、含蓄的爱情表达相反。在沈从文笔下，我们看到了湘西儿女别样的“爱情传奇”：放蛊“落洞”、私奔情杀、疯癫尸恋等。湘西儿女表达爱情的方式中也包含了人性的扭曲、野蛮的杀戮和道德的沦丧。这些都“不妨看为翠翠故事所‘未’实现的各种可能”，善良的读者只是就着故事构筑自己的桃花源，而“理想的悬

12)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版，第174页。

13)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2页。

宕、质变而非完成，才是主导沈作叙事意义的力量”。¹⁴⁾富有田园牧歌情调的《边城》实际上“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¹⁵⁾另一方面，一些似乎应该属于边城世界之外的经济关系也已经进入乡村世界，如渡船和碾房的被作为嫁妆进行对比，事实上现代文明的经济关系也在影响人际关系。这一世界的解构只是一个时间久暂的问题。“沈从文的原乡情结可以《边城》所召唤的桃源梦境为极致，但这寄托块垒的边城到底还是个落入时间陷阱的失乐园”。¹⁶⁾

2) 现代话语的植入

《长河》的问世，将平淡如水的湘西世界激起涟漪。午夜梦回的清静世界中植入了“现代感”的“冷眼看世界”，在这样冷静的视角观照下，沈从文的乡村生态的和谐之梦被破坏。1934年至1937年的两次返乡的差距，便是源于现代话语的视角植入。在“题记”里，沈从文明确感到“‘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¹⁷⁾“现代文明”不仅给湘西带来格局世事的变换，也使湘西人温润敦厚的处世德行和人与自然之间抒情写意的和谐，逐渐为“外来洋布煤油”破坏。《长河》中对吕家坪村民们接受“新生活”的态度的描写，实在让人忍俊不禁，但在近乎戏谑的表达中，着实让人感到乡村世界面对“现代文明”的入侵产生的真切焦虑。原有的社会秩序面临着解构的危机，一切正常的生活轨迹被打破，整个乡村世界把“现代生活”视为洪水猛兽。实际上，我们看到

14)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1页。

15)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选自《中国文学史料全编现代卷：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11年8月版，第62页。

16)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1页。

17)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7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分店，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长河》的故事线索是《边城》创作的延续，人物关系也是一一对应的：比如翠翠和夭夭、老水手和老船夫、傩送和三黑子、船总顺顺和橘园主人藤长顺等。只是在《长河》里，叙述重心随着人物关系格局的变化和现代暴力的侵入发生了改变。保安队长对橘子的逼抢和对夭夭的逼娶，成就了夭夭和三黑子爱情故事。在这里，《边城》中田园牧歌般的爱情诗已经在地方武装的暴力介入下幻灭，《长河》虽未有最后的结局，但夭夭的命运是注定的。翠翠的命运是因边城世界中淳朴无杂质的社会秩序造成的悲剧，让人扼腕叹息同时生出一种诗意的缅怀；而夭夭即将到来的悲剧命运，却是由于吕家坪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破坏而产生的悲剧，我们感到的更多是愤怒、无奈与感伤。《长河》的抒写依然是一首田园牧歌，但在“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作者“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的印像，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¹⁸⁾

3) 寻梦“商州”与乡土“梦碎”

同样，“商州”犹如对世外桃源的诗意描绘，文字间流露出礼赞似的炫耀，情绪指向的是作者眼下生活而又难以融入其中的城市生活。“商州三录”的写作初衷是将生养自己的乡土介绍给外界，字里行间流露出如数家珍般的夸耀，以此与难以融入其中的都市生活对比。“三录”这种带有深厚乡土情感的书写，也或潜或显地出现在商州故土的乡土想象中。台湾作家三毛读了有关商州的文字后获得“乡土的共鸣”，“您的故乡是我的‘梦魅’。商州不存在的。”¹⁹⁾贾平凹笔下的商州世界已经具有引领读者到“商州”寻梦的效果，并有“几位热血活跃勇敢好奇的年轻人”受了文字的激发而导致“寻梦”之旅，对此诗意的“画境”，贾平凹似乎有不同写作初衷，“这使我欣然同时惴惴不安”，“非我专意要学陶渊明，凭空

18)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7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分店，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19) 肖夏林主编，《废都废谁》，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

虚构出一个‘桃花源’”。²⁰⁾在“初录”和“又录”里，乡土生态世界诗意化却是一种昭然的存在。《莽岭一条沟》中描写了一个安宁、自在的乡土世界：虽为闭塞落后之地，十六户人家自给自足，依山而居。毗邻相隔，遥遥相望，声息相通，相互关怀，其乐融融。在这里，没有世俗的争斗和权力的倾轧，也没有生存的困窘，这里的人们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人伦秩序和乡土社会规范，如对外来落脚行人在门前置茶、置水，让吃、让喝。“贾平凹难以将对于乡土的夸炫态度坚持到底，‘三录’愈写愈深入‘世道人心’。贾平凹沉痛于山水风物间人的冥顽愚陋，知识浅见，作品的‘沉重化’亦势所必至”。²¹⁾“初录”和“又录”倾向于乡村风貌的呈现，“又录”中“小序”总结说“重在山光水色，人情风俗上”，“往后的就更要写到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变迁在这里的折光”。²²⁾然而，书写的重心由空间的生态环境转入人文生态语境，商州那沉重的历史沧桑自然显现出来。与《长河》一样，“三录”中从“初录”到“又录”是贾平凹一次次折返乡土所得的观感的纪录，是一一次次充满诗意的浪漫旅程。在长篇小说《秦腔》中这种诗意的“商州”被消解的干干净净。诗意的“商州”消失了，这里唱响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乡村的凋敝落寞以及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侵入下溃败的悲凉挽歌。在这里，城市的扩张和渗透，消解了乡村文化的基础。整个乡村生活常态秩序濒临瓦解，乡村文化逐渐衰落断裂。评论者说，“他的《秦腔》，以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地仿写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迷茫，作了充满赤子情坏的记述和解读。他笔下的喧嚣，藏着哀伤，热烈的背后，是一片寂寥，或许，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只能是巨大的沉默”。²³⁾如果说文学指向着人们心灵的通道，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给我们了一个和谐美好的灵魂净化，而从贾平凹的商州世界中暂且只看到了“落寂”和“萧条”。

进一步追索，《商州再录》有一长篇“题记”，其中感叹“商州”在现代文明

20)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3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38页。

21) 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22)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3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15页。

23) 谢有顺，《授奖辞》，《西安晚报》，西安报业传媒集团，2008年11月3日，第3版。

“侵入”之下的变化，在变化中可以看到山民们“能干而奸狡，富足而吝啬，自私，贪婪，冒险，分散”。显然，这些都超出了作者的想象，“不免使我愤怒”。“愤怒”是商州原始生态之梦被击碎后无以排遣无边沮丧的情绪反应。“商州三录”的写作相距不到两年，乡土的变化较之沈从文，贾平凹的乡土之梦破灭得更快。《周武寨》的所在地清风涧，地处偏僻、物产丰副、山清水秀，人们世代自在自足地生活着。脱离地域的线索，看着时代沿革变化，清风涧的世外之美掉入一个时间陷阱。清风涧演绎着从民国初年到“文革”结束，周、武两家的恩怨纠葛。由于人性扭曲而导致绵延不绝杀戮让这里断绝了路人。最终，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周、武两家幸存者对暴力相因悔悟，从而杀戮停止。两家后代最终结合，他们不回避过路人，对性快乐的尽情表达是清风涧又回归到自然生态的象征，彰显一种粗犷而原始的生命牧歌情调。《刘家三兄弟本事》中则描写了由于极端的贫困、愚昧所造成的性饥渴、性道德的丧失和性秩序的紊乱，正常人性也变得猥琐。刘家三兄弟中，老大成为当地“传奇”人物，成为“文革”中可笑的牺牲品。老二和嫂子死于违背伦常的性生活。老三不想和哥嫂们一起沉沦逃离了故土。在这里，作者创作初始主赋予乡土世界的生存诗意已荡然无存，极端贫瘠、匮乏的现实生存危机图景，却豁然地浮出历史地表。小说创作初期诗意的想象空间，因历史叙述的介入而真正成了“乌有之乡”。在小说《浮躁》中更是表达了这是梦幻般诗意乡土的想象终结。在明快的改革调子下，商州世界的乡村生命百态充斥着阴谋、倾轧和争斗，外界所有的风雨早已吹进了商州大地，巨大的历史车轮碾压者所有的关于沉寂优美的诗意图画——乌托邦的商州已经悄然瓦解。社会的转型时期，乡村的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观念得到了重新归置和评判，给闭塞的乡土和生活在此的村民们所造成的心理冲击。面对“外来者”不断侵入后，乡土世界已面目全非，贾平凹表达了困惑：“历史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平的下降和虚浮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实尚利世风的萌发呢？”²⁴⁾“商州梦回”也是一种找寻，一种应对失落的

24) 贾平凹，《变革声浪中的思索——〈腊月·正月〉后记》，《十月》，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心灵的回访。这与“《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心情的怀旧”是一样的。²⁵⁾文本中的湘西和商州作为一种乡土乌托邦的文学建构，是主体面对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无从应对的应对。恰如西方学者保罗·利科从“社会总体想象”层面进行分析的那样：“似乎只有诉诸意识形态的‘健康’功能，才能治愈乌托邦的疯狂性；似乎也只有通过‘乌有乡’的视角有意识地反观自身，才能实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²⁶⁾沈从文和贾平凹都不会满足于对意识形态这种无计可施的应对，诗意也不会是一种恒定的文字姿态。因而，他们一面在建构这种“乌托邦世界”的同时，自然也包含着一种历史解构的批判冲动，这促成了想象主体的“梦碎”和“梦醒”。

3. 文化身份的选择与文化审美的执守

不可置疑，每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试图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构筑“自己的世界”。作者笔下表达的“乡村生态”，不仅是一个自然空间，“这个空间与古老的传统、与过去的时空相关联，也与人类未来相关联。他的人物穿行于这个世界之中，体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蕴。”²⁷⁾

1) “乡下人”的审美视角

沈从文与贾平凹都是由乡村侨寓都市的文学探索者，他们同样保持着对乡村精神和生活方式的赞美和迷恋以及对冷漠疏离的城市壁垒的拒绝。“乡下人”

1984年第6期，第42页。

25)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26) 宋伟杰，《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7) 鲁红霞，《修辞学视野下的阎连科小说研究》，《小说评论》，陕西省作家协会，2012年第3期，第118页。

的目光和思维方式使他们始终以忧患的眼光审视城市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与湘西、商州进行对比，从而他们的文字中总是出现乡土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两个相互对立的生存状态与文化环境的碰撞和冲突。对于地域风情的礼赞，贯穿于沈从文、贾平凹乡土文学创作的始终。赵学勇认为，“沈从文和贾平凹的小说是风俗画，也是地方志，他们对湘西、商州的地域景观与乡俗民情的发掘垫高了各自文学领地的文化品味”。²⁸⁾沈从文常常把自己称作“乡下人”，并从艺术审美角度对湘西民俗文化表达的认同与赞美，改变了“五四”新文学对传统文化不遗余力的批判与否定。50年后，“文革”后又一个自称为“乡下人”的贾平凹，承继了沈从文的审美文化风格，以对商州大地的民俗文化的认同与张扬，改变了建国后当代文学对传统民俗文化的遮蔽或轻视。这两位“乡下人”文学功绩正是纠正了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缺失和谬误，给艺术审美带来了新鲜的思路与活力，开拓了创作空间，开掘了文学资源。

无论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湘西世界还是80年代以来的商州大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淡化，沈从文与贾平凹也正是在这一独特的领域开掘出乡土中国文明进程的历史趋势，并试图寻求一种融“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于一体的崭新的文化心理结构。30年代与80年代都是处于文化交替的，向现代社会急速迈进的转折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理想很难完全超越“乡土中国”这一现实，如何在自然与人性的探索中获得美与和谐的力量，是他们普遍的审美要求。沈从文与贾平凹也同样将审美目光投向这诱人的“乡土中国”。他们对人生形式的选择、文化性格、审美意识更多地带有中国农业文化的内涵。

贾平凹之所以与沈从文具有相似的审美气质与创作视角，除去时代转折的相似性以及“乡土观念”的执守，也源于贾平凹刻意地追寻探求沈从文的创作轨迹。他认为可以与沈从文产生心灵的共鸣：“有人喜欢一个作家，完全是因为这个作家和他有心理感应，而不一定是因为他的作品……”²⁹⁾贾平凹“早期多部

28)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29) 聂晓阳，杨一苗，《贾平凹孜孜以求的是“高贵”》，新华每日电讯，新华通讯社，2006年11月15日，第8版。

中篇小说套用了沈从文的‘《边城》图式’：诸如‘一老一小’的家庭结构，‘一女二男’的爱情模式，以‘绳渡’为支撑的叙事平台，以及将爱情故事与民俗传奇的血肉交融”。³⁰⁾贾平凹曾说：“沈从文对山水感觉气象和我对商州感觉很类似，我也能理解。只要功力达到，我也能写出这样的山水。”³¹⁾“商州系列”描绘秦汉文化环境中特有的生存方式和风土人情，展现了来自乡土之间的美好人情、人性，以一种清新淳朴的笔调营造出一个别具诗意美感的艺术世界。作家试图探寻古老的商州文化对现代文化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去伪存真，过滤掉愚昧、丑陋的鄙俗，凸显商州文化中的风情和人情之美。沈从文的《湘西》、《湘行散记》以绮丽的文字写就神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创造一种美的极致。“在20世纪的中国散文史上，《商州初录》十四篇是可以和沈从文创作于30年代的《湘行散记》十一篇那样，成为‘典范’的传世之作”。³²⁾可以这样说，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极具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艺术感觉的艺术家，他以文字描绘乡村生态风情，进行民族品德重造。贾平凹对商州山水地理的刻意经营和描绘，尽得沈文的真传和妙趣。沈从文以“乡下人”的倔强和对“乡村生态”的执守铸造了他艺术上无畏的坚强气质，使他能够浊世独立，坚守自己旷世独行的文学人格和审美艺术风格。他以乡村生态与都市文明的价值判断作为观照社会的载体，以一个“乡下人”的智慧与坚韧在转折时代的政治话语中找寻相对的独立的文学精神。

2) 自在和谐审美精神

沈从文将生命个体当作一种充满活力的、激情涌动的存在，这里的生命之美是对力量之美的崇拜，生命意义在于以原始之力冲破压抑、束缚人性的外部世界。往往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价值和秩序规范的激烈反叛也是这种

30) 陈非《贾平凹早期小说中的“<边城>图式”》，名作欣赏，北岳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期，第78页。

31) 王永生等，《贾平凹的语言世界》，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

32) 曾令存，《贾平凹散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崇尚生命力的鲜明体现。沈从文在他的湘西世界里，极力营造一个充盈着生机、跃动着活力的自然生态世界。在《边城》中，沈从文把对湘西自然风物的渲染和赞美蕴藏在字里行间，试图建立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自然的生命形式”。翠翠正式这种生命形式最为直接的表现。这是一个生长在青山绿水之间的自然鲜活生命体。“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然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做朴素的叙述。”³³⁾无论《边城》或是“翠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沈从文对乡村的美丽的想象，现实的乡村（包括具体的乡村生活场景和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似乎距离很远。翠翠只是徘徊于文明之外的“一只小兽”，与她的小狗追逐在山林之中。”³⁴⁾翠翠身上体现了湘西边地的风貌人情和文化传统以及当地百姓生存中的矛盾与困惑，包括他们之间复杂性格和情感关系以及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尖锐冲突，他们的成长和对命运的抗争，都真实地传达出了湘西世界的地域文化特征。因此，如果没有翠翠，便失去了解读湘西世界的文化筹码。翠翠在沈从文湘西世界中并不仅只是一个灵动的生命形象，也是背离尘世，生存于世俗之外的精神代码。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充满旺盛生命力的个体存在。我们看见，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从五岁起就喜欢同人打架，为一点小事，不管对面的一个大过他多少，也一面辱骂一面挥拳过去。不是打得人鼻青脸肿，就是被人打得满脸血污”；小豹子祖送，遇到别人欺负时，表面上不恼不怒，“且常常和气的微笑”，但机会成熟后便向敌人反击，经常“一板凳一柴块打去”，不是把人嘴巴打歪，就是把人膀子弄断。这些弥漫着血腥的文字，沈从文信手拈来，津津回味，他正是在这些暴力举动中发掘到了原始生命力的存在。贾平凹的创作心理与人格结构比沈从文更为复杂，贾平凹与政治的关系也要复杂得多。羸弱的性格以及时代转折的机遇，决定了他必须顺应时

33) 沈从文，《神巫之爱》，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34) 沈从文，《神巫之爱》，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代风气进行写作，再不可能像沈从文那样刻立独行，肆意徜徉在乡村生态世界中。80年代是一个开放和平，思想潮流潺潺涌动的年代，社会思想潮流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然而也是意识形态受到控制严格的社会转型期，贾平凹不可能选择像沈从文那样与社会变革潮流对抗的写作方式。他认为，“作家摆脱不了政治，但政治必须是大政治，关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才是大政治。每一位作家都有责任记录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所以，真正考验一个作家水平的，应该是关注现实，因为关注现实，就是关注人类文明的进程”。³⁵⁾如果说沈从文乡土之梦是以原始生命之力来获取个体自我的生命自由，贾平凹所寻求的则是以生命之力的和谐来实现生命的自由。那么，和谐是贾平凹审美的价值核心。这种和谐状态的实现要求坚守人的内在自主性与自我完善。它并不以力的形式对抗外部世界的侵入，而是强大自我的形式力求外部世界无法进入。在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描述中，作家虽然同沈从文一样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和酣畅淋漓的表现自然之力的和谐美好，但这种自由更多的是通过自我忍耐、坚守和完善来实现的。沈从文的文化立场多了一些独断之气，贾平凹则表现的模糊许多，这正是他在城市中安身立命的一种聪明方式。沈从文是在现实世界以外重构了一个充满想象魅力的边缘世界作为自己的心灵的“希腊小庙”；贾平凹则寻求对现实世界重新认识，并作个体化的心理定位，支撑其在现实世界生存。可以说，贾平凹更多的是立足现实，从寻求一种人格完善和心灵满足，更具有开放性特征，正如他在《〈商州再录〉题记》中表述，“这些所谓甲本的篇章，并不是为了写过去而写过去，意在面对现实，旨在提高当今。”

“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崛起，正当同期其他作家们纷纷接露“文革”黑暗、倾诉经历的苦难的时，贾平凹从全新的视角来发觉人性中的美好的生命力；当文坛齐唱美好人性、人情的赞歌时，他却又低吟出沉郁灰暗的《晚唱》、《好了歌》、《二月杏》。80年代，又是一个颠覆传统思想的年代，几千年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面临了巨大的挑战。随着社会进步，物质

35) 聂晓阳，杨一苗，《贾平凹孜孜以求的是“高贵”》，新华每日电讯，新华通讯社，2006年11月15日，第8版。

逐渐丰富，人们欲望疯长，精神面临巨大的空洞危机，文化规范的缺失导致人与人关系功利化、物质化、世俗化。贾平凹反思自己的创作，放弃了早期散文、小说那样单纯面向自己心灵，将视角转向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巨轮碾压下的乡村芸芸众生的生存及其心理情绪，转向了描绘面对传统文化的尴尬和人的心灵困境。改革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而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饥荒和社会流弊以及改革带来的现代文明对乡土文明的巨大冲击。作家不得不重新审视乡土文化，思考现代文明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负面作用。此时，贾平凹的创作视角逐渐由乡村转入城市，传统乡土立场并没有改变。作为与沈从文一样来自乡村又侨寓“城市边缘人”，贾平凹对乡与城在时代变革中的深刻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对立充满困惑甚至绝望。他时常徘徊于现代都市文明与传统乡村文化之间，并表现出来对城市文明深深倦厌，同时为现代人的精神缺失和异化和自我的堕落痛心疾首；对传统乡村文化保持着足够的警醒，为乡村文明逐渐被蚕食唱着凄凉的挽歌。这是贾平凹在长期文学创作中的深切感受，也是他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贯穿始终的精神线索与价值抉择。贾平凹站在乡土写实的立场上，力图描绘真实的乡村生态图景，又承继着沈从文的乡土浪漫的想象传统，在“田园诗风”的诗意浪漫里融入批判国民性的意识，在现代乡土文学的“两大母题”之间游刃有余，将9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土文学推向一个新高峰。

结 语

综上所述，沈从文的书写更加自然、质朴、亲切，充满原生之力，生命的体验更真实具体，还原一幅真实的乡村生态图景。贾平凹的书写如一个“符号的宇宙”，“艺术就是虚构的东西。我就是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一个符号系统，一个意象世界”。如果说沈从文是心灵的建造师，贾平凹更像一个想象力的探索者和心灵的思考者，既探索健康生命形成的可能，又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发生的内在冲突和衍变。无论何种形式，沈从文、贾平凹大胆无畏地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和乡村之梦，使生命冲破外界文明的藩篱而狂欢怒放。在沈从文与贾平凹的乡土造梦过程中，沈从文崇尚生命原始之力，而贾平凹则更向往生命和谐之美。但不论何种追求，作家都赋予了乡村世界无尽的生命力，以一个健康、优美、充满人性特征的生态形象展现人前，实现着他们城市中的乡土梦。

參考文獻

-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四卷),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联合编辑出版,1984年版。
-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
-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
- 禹建湘,《乡土想象:现代性与文学表意的焦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美)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 王华,《新世纪乡土主题研究》,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社会调查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张新颖,《沈从文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贾平凹、郜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话》,载郜元宝、张冉冉编,《贾平凹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贺仲明,《乡土精神:乡土文学的未来灵魂》,山东:《时代文学》,2011年9期。

Abstract

Freehand Brushwor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Ideal about Rural Ecology — Chinese Poetic Writing And Reality Freehand Brushwork about “Border Town” And “Shang Zhou”

Zhu, Ling

Shen congwen and Jia pingwa are full of preference and bakeries in rural ecological world xiangxi and shangzhou. There is the modern think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found reflec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psychology. Shen congwen used in poetic discourse writing rural ecological against urban decay, indifference and evil; while jia pingwa is trying to free from the era mainstream discourse and get rid of the control the text by the ideology,so as to build the idea of a “holy land”. They played the role of successor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nd aesthetic ideal and future oriented culture pioneer. At the same time they resolutely resist the ills of modern urban civilization bringing to pollution and invasion for the pure local. They write “the spirit of the earth” in poetic aesthetic spirit,at the same time cling to the moral orde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rural world.

Key words : Rural Ecological, Xiangxi and Shangzhou, Poetic Writing, Reality Enjoyable

투 고 일 : 2015. 9. 10. / 심 사 일 : 2015. 9. 15.~ 2015. 10.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5. 10. 16.